



異地相逢—— 朝鮮王朝與清宮藝術交會特展

■ 朱龍興

「亞洲藝術節」自 2017 年起成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（以下簡稱故宮南院）每年 10 月的一項重要活動，在經年累月的持續辦理下，除了提供民眾體驗亞洲各地文化的機會，也讓外界從另一個角度瞭解院藏文物的多元特質。

2023 年，故宮南院將視線投向北方，以「韓國月」作為「亞洲藝術節」的活動主題。與此同時，特別以「朝鮮王朝與清宮藝術交會」為主軸，推出為期三個月的特展。展出的文物因「朝鮮王朝」而齊聚嘉義，為觀眾鋪陳出一段近世中、韓二地人與物相遇的故事。本文針對展覽所敘述的脈絡，提出簡要的介绍，希望讀者經由文章的陳述，能大致掌握展覽的內容，進而提高觀展的樂趣。¹

認識朝鮮

近年來，韓國流行文化在全球掀起陣陣熱潮，成功吸引各處民衆前往當地感受獨特魅力。不論遊客來自何方，兌換韓元可說是必要的準備工作。細看紙鈔上的圖案，皆以朝鮮王朝（1392-1897）的人物為代表，可見朝鮮王朝在韓國人心目中具有不可取代的象徵意義。在這當中，一萬韓元（相當於新臺幣 240 元）以世宗大王（1418-1450 在位）作為主要的識別圖像（圖1），由此，不難推測世宗在韓國歷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
當觀眾進入展廳，最先接觸視線的文物，便是世宗主導下所出版的《訓民正音》。（圖2）本書的內容主要在教導民衆如何經由 28 個表音字母，透過書寫，傳遞想要抒發的思想。這種特有的韓國字母後來稱為「諺文」或「韓字」，成為最能彰顯韓國主體性的文字符號。一般來說，雖然「韓字」一直到二十世紀才廣泛使用，但展場中《續三綱行實圖》、《字恤典則》等攸關平民政策或教育的選件，說明韓字在問世後，一直在朝鮮時代佔有一席之地。

獨創韓國文字的朝鮮王朝，又是如何建立當地的歷史與地理知識呢？長久以來，臺灣民衆對於韓國歷史的瞭解多來自中國史書上的記載。事實上，朝鮮文士以另一種書寫的脈絡呈現自身的歷史，例如《東國史略》便以帶有神話性質的檀君，作為開啓韓半島歷史的重要人物；至於對地理的測繪，從現存〈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〉的摹本來看（圖3），十五世紀初，朝鮮人對於韓半島的測繪水準已超越其他區域的能力。²另外，李荇（1478-1534）所編輯的《新增東國輿地勝覽》，亦能呈現朝鮮對於地理調查的認真與細緻。

需注意的是，朝鮮人並不侷限於探索韓半島的世界，對於海外的知識探索其實未曾間斷，

例如 1603 年由漢城（今首爾）前往大明北京的朝天使節團，帶回了利瑪竇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所繪製的世界地圖。這種蒐集境外情報的舉動，也發生在 1631 年，當時鄭斗源（1581-?）從中國將艾儒略（Giulio Aleni, 1582-1649）所編纂的《職方外紀》攜回宮中。以上的種種事例，說明了朝鮮王朝雖未與西洋直接交流，但對海外世界實抱持著相當程度的興趣。³



圖1 大韓民國一萬韓元紙鈔 作者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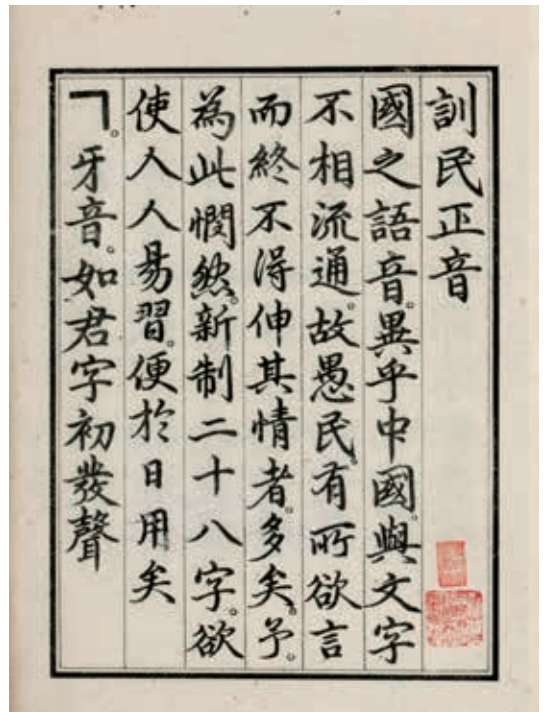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朝鮮時代 《訓民正音》 1946 年首爾市朝鮮語學會影印本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432.4 741

中韓使節往來

有關朝鮮王朝對外連絡的工作，屬於朝鮮使節所負責的範疇，那麼使節進行的方式為何呢？以朝、清為例，在一份 1723 年的清宮奏摺中，清楚交待從朝鮮前往大清北京的使節團規模，春夏約為二、三百人，而冬季則可達四、五百人的陣仗。但是，並非每位使節團的成員都兼負國家外交的重擔，從正式的受賞使節名單中，得知主要的外交人員由正使、副使、書狀官、大通官、押物官、從人所組成，絕大部分的朝鮮人都是隨著出使的機會，前往中國進行買賣交易。此外，也有成員是因為家族中的長輩奉派出使，得以趁機隨同前往一覽中國，朴趾源（1737-1805）與金正喜（1786-1856）出訪大清都是這樣的例子。

這些來到中國的朝鮮官員，其外貌形象是如何呢？從《皇清職貢圖》中（圖 4），可見朝鮮官員以明代常服作為身份的象徵，如此的服裝樣貌或許亦透露出朝鮮面對明清的態度。朝鮮雖然於 1637 年改奉大清正朔，但大部份朝鮮文人仍守著對大明的認同，撰寫《小華外史》的吳慶元（1764-?）便是其中一人，他在〈凡例〉中即述明：「皇朝（明）之於我國義雖君臣，恩踰父子，實乃外藩之所未嘗有而載籍之所未曾見也。」又說：「虔奉正朔乃此書之開卷第一義也，故大書皇朝年號之下分註我朝幾年。」展現了實體上獨立思辨的立場。⁴

表面上，《皇清職貢圖》雖注意到朝鮮官員的袍服樣式，然與朝鮮奮武功臣〈李遂良肖像〉比對（圖 5），仍可以發現二者在衣領等細節存在著明顯的差異，說明了朝鮮王室對於典服禮儀嚴格地遵守一定的規範，不論是王的出巡或者是官員的就任，從其儀隊的陣容均可看出嚴謹的秩序。〈安陵新迎圖〉中（圖 6），掌旗者依紅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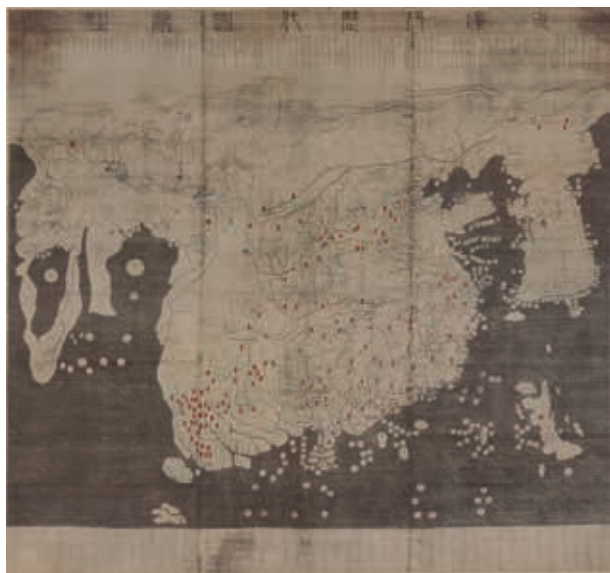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 約 1500 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 依朝鮮 1402 年原本摹寫 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 021.1/103/1

藍、黃、白、黑等順序引領隊伍前行，其後接著手持豹尾、貫耳的班次，再由中軍率領樂隊，以管樂壯大新官上任的聲勢，緊接其後的是兵房、執事，以及官員府上的小吏，之後，包含女眷、女妓等隊伍，伴隨著三頂大小不一的轎子徐徐前進。特別的是，這件手卷展開的方向由左往右，完全與中國畫卷背道而馳。畫幅開端有上任官員兒子樂山軒為這件圖畫所作的說明，他特別指出此畫是聘請宮廷畫師金弘道（1745-1806）所作，從用筆來看，本作與金弘道的風格有所不同，推測或為摹本，雖然如此，但仍可作為理解金氏形塑各類人物造型功力的材料，此外，亦是研究十八世紀儀隊陣容的重要作品。

東亞海域意外遇見朝鮮人

來到中國的朝鮮使節，多循著既定的規畫往返，然而出現在異地的朝鮮人，並非全然隨著使節團跨越邊境。本院所藏的清宮奏摺中，記錄了不少朝鮮人出海作業卻意外漂流他鄉的實例。



左圖4 清 《皇清職貢圖》 局部 嘉慶十年（1805）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14151

右圖5 朝鮮時代 1751 李遂良肖像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Asian Art Museum, Gift of Arthur J. McTaggart, 1992.203.a

1796年八名來自全羅道的朝鮮人漂流至澎湖；1826年九名來自耽羅島的民衆出現在噶瑪蘭；1841年一艘載有十一名全羅道漁民的船隻，漂至淡水。這些從北方來的朝鮮人皆不通漢語，幸運的是，漢字在東亞地區的通用讓返家之途得以確認，如1796年因到外島買粟而漂至澎湖的八名朝鮮人，雖言語不通，但幸好其中一位李邦翼能寫漢字，終能順利返國。⁵不過，也會出現言語不通又無法以漢字筆談，而難以處理的案例，1841年漂至淡水的朝鮮人便屬這樣的狀況。幸運的是，其中三人各帶鐫刻漢字的腰牌，從所刻的「靈巖」二字，得以尋出



圖6 朝鮮時代 約1786 傳金弘道 安陵新迎圖 局部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Asian Art Museum, Gift of Evelyn B. McCune in memory of George McAfee McCune, 1991.181



左圖 7 朝鮮時代 林僖喆戶牌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：<https://www.museum.go.kr/site/main/relic/search/view?relicId=94365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3 年 9 月 8 日。

右圖 8 1832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. Koorai (*Nippon Atlas*. 19-20) 日本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：https://catalog.lib.kyushu-u.ac.jp/opac_detail_md/?lang=1&mode=MD820&bid=1906478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3 年 9 月 8 日。

這些漁民來自於全羅道。今日，我們仍可在博物館的收藏中，見到類似的掛牌。（圖 7）可惜的是，清宮奏摺中並未描繪下這些漂至海外的朝鮮人，所幸駐守於日本長崎出島的荷蘭商館館長施福多（Phillip Franz von Siebold, 1796-1866），在名為《日本》（*NIPPON*）的專著中，請人將漂至九州的朝鮮人仔細描繪下來（圖 8），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出海工作的朝鮮平民模樣。

要另外補充說明的是，除了臺灣可見到漂流而來的朝鮮人，在朝鮮亦有來自臺灣船隻而擱淺當地的例子。1686 年，《朝鮮王朝實錄》記載游魏等八十多名漢人，原本從臺灣啓航要去日本，中途卻漂至了朝鮮南方的珍島，所幸朝鮮宮廷命當地官府「修改破船，給糧回送」。⁶讓此一事件最終得以平安落幕。以上事例皆說明東亞海域的周圍地區，因海洋所形成的共同生活體。

不論經由正式的使節管道，抑或是意外的漂流相遇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接觸後總會產生交會的火花。朝鮮與明、清之間的交往，董越（1430-1502）、華察（1479-1574）、朱之蕃（1558-1626）等「天使」是較為人知的重要代表。三人分別於 1488 年、1539 年、1606 年前往韓半島，皆留下文化交流的紀錄。董氏出訪後所撰寫的《朝鮮賦》不僅在朝鮮刊刻出版，甚至為東瀛人士所關注；華察與朝鮮文士因緣相遇所共同吟誦的詩詞，被集結出版成《皇華集》，得以唱詠於後世；⁷朱之蕃本身除了文學造詣深厚，亦擅於書畫創作，其作品深受朝鮮人喜愛，除此之外，經由朱之蕃的介紹，不僅晚明文豪王世貞（1526-1590）深受朝鮮人的敬重，王氏許多著作也因此於韓半島造成不小的影響。⁸上述使節的藝文創作，當然是展場中不可輕忽的重要臺柱。

韓半島的紙

上文所提及的王世貞，對朝鮮書蹟十分讚賞，他特別將蒐集的朝鮮諺文裝裱成卷，在紀錄的跋文中，不僅提及朝鮮用墨的濃厚，也特別注意到玉石質地般的紙張。⁹ 確實，來自韓半島的紙張向來深受中國文人的注意，其製程也經常成為被探索的主題，例如宋應星（1587～約1666）在《天工開物》中便指出：「朝鮮白確紙，不知用何質料？」¹⁰ 很顯然的，宋應星可能未讀過董越的〈朝鮮賦〉，董氏在文中即記載：「紙造以楮，而以繭認者，以其搗練之工。舊皆傳其國所出之紙為繭造，至乃知以楮為之，但製造工耳。予嘗以火試之而知其然。」¹¹ 雖然董氏沒有詳述製紙的工作，但至少已提及如同蠶繭般堅韌的朝鮮紙是以楮樹為原料，經由搗練等特殊作法所成。對於朝鮮紙的著迷，從明代一直延續到清朝，董其昌（1555-1636）的

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便以鏡光箋作為書寫的紙張，而清朝吳振棫（「棫」音同域，1790-1870）所寫的《養吉齋叢錄》更是紀錄清宮藏有來自朝鮮多種尺寸的不同色紙。¹²

流動於中韓間的書風

其實早在朝鮮時代之前，來自韓半島的紙張便成為文人書寫時的愛用物品，趙孟頫（1254-1322）應當就是其中之一，他在書〈楔帖源流〉時曾在紙上指出「此紙雖出高麗，亦非良品。」（圖9）短短幾字除了暗示來自韓半島的紙在當時享有不錯的評價，也揭示趙孟頫可能經常接觸而能分辨高麗紙的品質。趙孟頫與韓半島的關係不僅止於紙張的聯繫，朝鮮對於趙孟頫的書法一直十分傾心，宮中不僅收有趙孟頫的書蹟，1455年更翻刻趙孟頫所寫的〈赤壁賦〉，送交成均館，成為學生習書的範本，¹³ 趙氏的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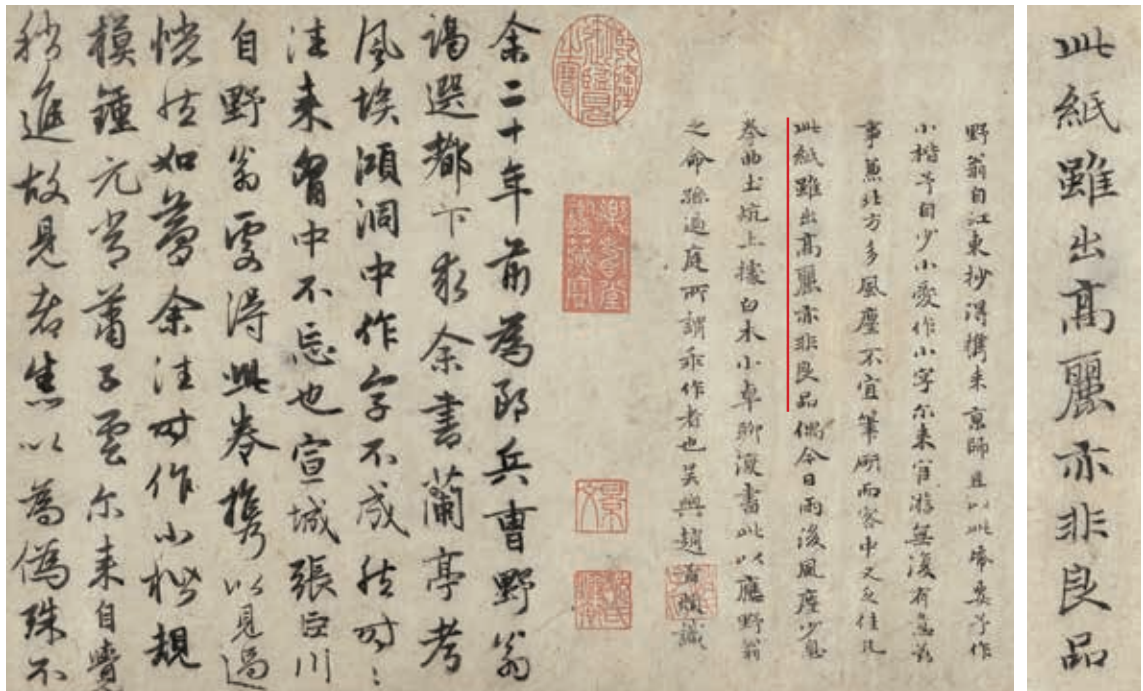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 元 趙孟頫 書楔帖源流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086

法風格在韓半島成為著名的「松雪體」。

朝鮮對趙孟頫書〈赤壁賦〉的熱愛，除了體現了趙孟頫書法在韓半島所造成的旋風，應該也相當程度地反映了〈赤壁賦〉作者——蘇軾（1037-1101）在當地所享有的聲望。事實上，早在高麗時代（918-1392）蘇東坡就在韓半島十分出名，雖然之後關注的熱度稍減，但於朝鮮後期又再度引發熱潮。究其原因，四庫全書的編纂者翁方綱（1733-1818）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。翁氏追隨宋犖（1634-1714）舉行與蘇軾相關的紀念活動，他在 1773 年起一連辦理了超過 20 次的「壽蘇會」，集會中，欣賞「東坡笠屐圖」是重要的活動項目之一，¹⁴ 甚者，宋犖更將「東坡笠屐圖」刻於硯臺底部。（圖 10）如此頻繁且不中斷的集會，讓來自朝鮮使節團的友人也有機會親自參與，以秋史體書法聞名韓國的金正喜就是其中一人。雙方往來下，這股風潮成了朝鮮文人間的特殊景象，申左模（1799-1877）〈拜審東坡小像〉記錄了這樣的集會：

地與人遐歲又千，茲來恭喜拜蘇仙。
芋仙壁上，掛小坡小像，要余拜審。

軒髯笠屐圖堪證，真蹟烏雲帖尚傳，
赤壁磯寒遺笛響。東坡生日，計陽四
日。墨梅堂邃裊香烟，感君藏本分相
贈，衣法眉山悟夙緣，芋仙出墨本二
像，與海觀及余。¹⁵

藝術交會的風景

除了書法作品反映了二地藝術的心領神會，同樣的情形也出現於繪畫當中。經由書籍的流通，中國所出版的《海內奇觀》、《顧氏墨譜》等圖冊陸續傳入韓半島，成為當地文人的手中讀物。以《海內奇觀》來說，朝鮮文人即使未至中國，仍得以一睹彼處的風景名勝。當金昌翁（1653-1722）前往金剛山遊覽時，發現他眼中的世界，竟然神似《海內奇觀》中所見的黃山（圖 11），他在〈東遊小記〉如此描述：「自內山五歲蒼，踰嶺而未及普門六七里許，行跨嶺脊而東向俯視。但見其萬劍束鉞，千戟攢枝，屹屹直上，騰騰飛動。乍遇之，令人錯愕。終焉喜忭，便有朝睹甘夕死之意。嘗覽海內奇觀，惟黃山圖似之。」¹⁶ 將



圖 12 朝鮮時代 1847 金剛山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Asian Art Museum, Gift of Andrews D. and Kay E. Black, 2017.78



圖 10 清 宋學 東坡笠屐圖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故文 000042



圖 11 明 楊爾曾編 《新鐫海內奇觀》 黃山圖 明萬曆三十八年（1610）楊爾曾
白堂刊豹變齋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8935

選件中的〈金剛山〉與金氏所見的黃山圖並陳（圖 12），應能理解享有「一萬二千峰」盛名的金剛山，為何讓人想起《海內奇觀》中黃山所呈現的群峰奇景。要特別強調的是，即便金昌翁遊覽金剛山時聯想到他曾經看過的黃山圖，但身臨金剛山的經歷，應該不是任何畫冊所能

比擬的體驗。

從藝術史所關注的角度思考，並陳二件相同主題圖像，除了爬梳二者之間影響的系譜，關注相同元素在不同區域所產生的「在地化」詮釋與表現，亦是不可忽略的課題。以「蟠龍」作為器物紋飾來看，本院典藏的朝鮮〈嵌鏤鈿





圖 13-1 朝鮮時代 嵌螺鈿龍紋衣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贈漆 000001



圖 13-2 朝鮮時代 嵌螺鈿龍紋衣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贈漆 000001



圖 14 唐 海獸葡萄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0324

龍紋衣箱〉（圖 13）展現了有別於清宮漆盒的樣貌。這件漆盒不採剔漆的技法表現主題圖案，而以多樣材質的黏貼，構成表面的裝飾紋樣。細看箱盒外觀，工匠利用螺鈿、魚皮、玳瑁多種材料，將舞動的龍紋展現於不同的立面上，突破框架的表現方式，反映出朝鮮工匠無所拘束的創意想像。

從差異走向共有

上文的陳述旨在強調同一主題經不同區域所展演出的差異性，若從「共有的話題」此一面向，再思考藝術間的關係，將可得到更多值得討論的空間。以葡萄為例，這種來自於中亞的外來植物，很早就成爲東亞藝術家所喜愛的表現題材。院藏唐朝一系列的葡萄紋鏡是當中的代表

(圖 14)，工匠利用藤蔓將結實纍纍的葡萄環繞於鏡子背面的中心，形成無限綿延的意象；以畫作來看，沈周（1427-1509）《寫生》冊中的〈蒲桃〉（圖 15）應是大眾較為熟悉的作品，沈周將濃淡不一的綠、紫及墨色，以精簡的筆法作於紙面上，成為文人觀物的一種趣味。不論是銅鏡或是圖冊，這些葡萄的多種外貌，多半以觸手可及的距離作為欣賞的方式，相較之下，十七世紀後，朝鮮將葡萄繪於大型屏風的作法，在藝術史

上便具有相當的獨特性。展覽中吳南運（1753-?）的〈葡萄屏風〉（圖 16）中，可見葡萄藤蔓以上下起伏的律動方式，順著風勢由右至左逐漸伸展，此外，畫家也利用墨色的濃淡變化，營造出畫面的深度空間，不難想像，作為室內擺設的屏風，必定為居住空間增添不少的生活情趣。

除了象徵後代子孫生生不息的葡萄，朝鮮時代還常以桃、鶴、鹿等象徵吉祥的母題組成祝賀長生的圖像。（圖 17）除此之外，對於博



圖 15 明 沈周 寫生 冊 蒲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28



圖 16-2 朝鮮時代 1823 吳南運 葡萄屏風 局部



圖 16-1 朝鮮時代 1823 吳南運 葡萄屏風 荷蘭國立博物館 (Rijksmuseum the Netherlands) 藏 AK-RAK-216-4: Rijksmuseum. Purchas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Autobinck Fonds/Rijksmuseum Fonds

古知識的熱忱，亦可說是東亞的共同話題。在中國，對於古物的鑑賞，北宋《宣和博古圖錄》是早期的典範，然而這類描繪文物的博古方式，基本上屬於皇家私人的鑑賞範疇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約略在十五、六世紀後，博古活動才逐漸風行於市井中。杜堇（約活動於 1465-1505）的〈玩古圖〉（圖 18）讓我們一窺明代文人賞玩古物的文化活動，如此的收藏嗜好，或可以清宮多寶格作為古玩收藏的巔峰。相較於乾隆皇帝（1735-1796 在位）致力將宮中古物收納進多寶格中，¹⁷差不多時間點在位的朝鮮君王正祖（1752-1800 在位），則以另一種手法，令宮中畫師在座位後方描繪冊架圖，並將此作為游心寓目的想像媒介，表現出對於知識的熱愛。¹⁸

朝鮮冊架圖又稱為「文房圖」，從字面上不難理解，這類圖畫主要展現書齋中的一景，由此彰顯對書冊喜好的雅趣，同時反映了朝鮮文人對於書籍冊架的重視。朝鮮趙宇鳴（生卒年不詳）如此描寫老師丁時翰（1625-1707）的起居



圖 18 明 杜堇 玩古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690



圖 17 朝鮮時代 1750 ~ 1850 十長生漆桌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Asian Art Museum, Museum purchase, 2016.37



圖 19 朝鮮時代 約 1860 ~ 1874 李亨祿 (李膺祿) 冊架圖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Acquisition made possible by the Koret Foundation, the Connoisseurs' Council and Korean Art and Culture Committee. Re-mounting funded by the Society for Asian Art

空間：「所居易安齋，草屋數間也。房壁兩隅，設冊架，積千餘卷書籍。」¹⁹ 在在說明了書籍對文人扮演著不可取代的象徵性。朝鮮冊架圖剛開始被繪製而成時，多以書冊為圖繪的內容，後來，陸續加上器物等珍玩，使畫面的呈現更見豐富。朝鮮冊架圖除了以書架為主體的作圖（圖 19），還有有二種見於東亞其他地區的冊架圖種類，學界以其構圖特質分別稱為「堆疊型冊架圖」（圖 20），以及「離散型冊架圖」。²⁰ 不論是何種型態的冊架圖，都說明了朝鮮晚期以圖像浸染於博古知識的生活情趣。

要特別提出的是，不論是祈願祝福，抑或是博古知識，這些東亞共有的話題在臺灣已實際融入生活環境當中。例如，當一般民眾走進供奉神祇的廟宇，不難見到博古圖及長生祝壽圖以不同的方式呈現於信眾眼前（圖 21），這些圖像的存在，成了我們連結朝鮮藝術的特殊管道。



圖 20 朝鮮時代 約 1800 ~ 1900 冊架圖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Asian Art Museum, Museum purchase, 1991.322



圖 21 (左) 博古圖；(右) 壽桃仙鶴圖 作者攝於嘉義朴子配天宮

結語

遙想朝鮮晚期的民衆，利用冊架圖體會與古對話，形成一股雅致的生活風潮。經由欣賞紙上所描繪的文房圖像，如同經歷了一場虛擬的博物館之旅。與此不同的是，「朝鮮王朝與

清宮藝術交會」特展透過實體的展陳文物，除了引領觀眾與朝鮮相關文物相逢於南院，更期待觀展的民衆，皆能盡情體驗這場難得的亞洲藝術之旅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

註釋：

1. 有關本展陶瓷選件的介紹，請另外參見本期刊林容伊女士的專文說明。
2. 〈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〉的研究見 G. Ledyard, "The Kangnido: A Korean World Map, 1402," in Jay A. Levenson eds., *Circa 1492: 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* (Washington: National Gallery of Art, 1991), 329-332.
3. 有關西洋地圖傳入朝鮮的研究整理見汪前進，〈歷史上中朝兩國地圖學交流〉，《中國科技史料》，15 卷 1 期（1994），頁 12-16。鄭斗源於 1630 年前往北京的紀錄可見氏著，〈朝天記地圖〉，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、成均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，《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·第 7 冊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 53-232。有關鄭斗源攜回的西洋圖書詳情見（朝鮮）純宗命編，《國朝寶鑑·第 11 冊》，卷 35，1909 年，壬辰字版，頁 17-18。檢索於《韓國奎章閣文獻檔案館》<https://kyudb.snu.ac.kr/>（檢索日期：2023 年 9 月 9 日）。
4. 《小華外史》的研究見孫衛國，〈朝鮮吳慶元《小華外史》考論〉，收入氏著，《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，2009）。有關朝鮮對明清的態度差異，可參見：孫衛國，《從「尊明」到「奉清」——朝鮮王國對清意識的嬗變（1627-1910）》（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，2019）；吳政權，《眷眷明朝：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：1600-1800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，2015）。

5. 相關研究請見衣若芬，〈漂流到澎湖——朝鮮人李邦翼的意外之旅及其相關書寫〉，收入張伯偉編，《域外漢籍研究集刊·第4輯》（北京：北京中華，2008），頁131-156；劉序楓，〈漂泊異域——清代中國船的海難紀錄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65期（2013.8），頁16-23；劉序楓，〈清代檔案與環東亞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——兼論海難民遣返網絡的形成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23卷3期（2006.3），頁91-126。
6. 《朝鮮王朝實錄·肅宗實錄》（太白山史庫本），冊19，卷17，「肅宗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」條，頁33b，取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、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，《明實錄、朝鮮王朝實錄、清實錄資料庫》<https://hanchi.ihp.sinica.edu.tw/mqlc/hanjishilu?@3^1730199714^807^^702110020019001300080022^2190@@1775234289#top>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10月12日）。
7. 關於學界對《皇華集》的研究，請參見衣若芬，〈韓中日所藏《皇華集》與東亞漢文學跨國交流〉，收入張伯偉編，《域外漢籍研究集刊·第14輯》（北京：北京中華，2008），頁283-296；另亦請見本期刊吳政緯先生的專文。
8. 廖肇亨，〈從「搜奇獵異」到「休明之化」——由朱之蕃看晚明中韓使節文化書寫的世界圖像〉，《漢學研究》，29卷2期，（2011.6），頁53-80。
9. （明）王世貞，〈朝鮮三咨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弇州山人續稿》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邵王氏家刊本，平圖015448），卷165，頁20-21。
10. （明）宋應星，《天工開物》（民國十五至二十年武進陶氏涉園石印喜咏軒叢書本），卷中，頁4，檢索於「中國基本古籍庫8.0版」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10月15日）。
11. （明）董越，《朝鮮賦》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朝鮮嘉靖十年刊本，故觀012171），頁26-27。
12. 何炎泉在有關古代箋紙的研究中指出，董其昌特別喜愛以鏡光箋做為書寫的媒材，他同時說明這種紙的特性是表面光滑不吸墨，墨痕可清晰的保留於紙面上，見何炎泉，〈澄心堂紙與乾隆皇帝：兼論其對古代箋紙的賞鑑觀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3卷1期（2015.9），頁315-366。有關清宮所見來自朝鮮紙的種類見（清）吳振棫，《養古齋叢錄》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光緒二十二年錢塘吳氏刊本，贈善006686），卷26，頁5。
13. 《朝鮮王朝實錄》中載：「永膺大君瑛家藏趙孟頫《赤壁賦》等本，印送成均館，令學生用為楷範。」見《世祖實錄·下》，卷1至卷2，「八月至十二月」條，取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、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，《明實錄、朝鮮王朝實錄、清實錄資料庫》<https://hanchi.ihp.sinica.edu.tw/mqlc/hanjishilu?@3^1730199714^807^^8021100200070003000200030019^1@@1353722674#top>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10月12日）。
14. 相關討論請參見衣若芬，〈翁方綱藏蘇軾“天際烏雲帖”與十九世紀朝鮮“東坡熱”〉，收入張伯偉編，《域外漢籍研究集刊·第11輯》（北京：北京中華，2015），頁344-367；毛文芳，〈禮物：朝鮮與盛清文人的畫像墨緣及相涉問題〉，《中正漢學研究》，28期（2016.12），頁191-240。
15. 見（朝鮮）申佐模，〈拜審東坡小像〉，收入氏著，《澹人先生文集一·卷5》（首爾：景仁文化社，1999），頁407；亦見《韓國文集叢刊DB資料庫》<http://db.mkstudy.com/zh-tw/mksdb/e/korean-literary-collection/book/reader/8823/?sideTab=toc&contentTab=text&articleId=1300775>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9月8日）。
16. 見（朝鮮）金昌翁，〈東遊小記〉，收入氏著，《三淵集·卷24》，《韓國文集叢刊DB資料庫》<http://db.mkstudy.com/zh-tw/mksdb/e/korean-literary-collection/book/reader/8635/?sideTab=toc&contentTab=text&articleId=1140082>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9月8日）；石守謙對金剛山與東亞奇景山水的關係有更為深入的討論，請參見石守謙，《山鳴谷應：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》（臺北：石頭出版社，2017），頁270-286。
17. 有關清乾隆對於多寶格的收藏研究，請參見余佩瑾，〈品味與意圖——清乾隆「集瓊藻」多寶格初探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94期（2007.9），頁16-27；侯怡利，〈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——以乾隆八年（1743）重裝百什件為例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36卷2期（2019.10），頁45-114。
18. （朝鮮）南公轍（1760-1840）曾記下正祖的訓語：「命畫工寫冊架，付之座後。」見南公轍，《金陵集·卷20·日得錄》，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，《域外漢籍珍本文庫·第2輯》（重慶：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，朝鮮純祖十五年刊本），冊26，頁292；亦見《韓國文集叢刊DB資料庫》<http://db.mkstudy.com/zh-tw/mksdb/e/korean-literary-collection/book/reader/8789/?sideTab=toc&contentTab=text&articleId=1259108>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9月8日）。
19. （朝鮮）趙宇鳴，〈後錄〉，收入丁時翰，《愚潭先生文集二·卷10》（首爾：景仁文化社，1999），頁280；亦見《韓國文集叢刊DB資料庫》<http://db.mkstudy.com/zh-tw/mksdb/e/korean-literary-collection/book/reader/8584/?sideTab=toc&contentTab=text&articleId=1095114>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9月8日）。
20. 有關冊架圖的分類型態，請參見 Eleanor Soo-ah Hyun 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站上的說明：https://www.metmuseum.org/toah/hd/munb/hd_munb.htm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9月15日）；此一主題更深入的研究請參考李定恩，〈十八、十九世紀中韓新文物陳列圖像之傳播——以冊架圖為中心〉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20）。